

嵌入式运作：东北对四川三线建设城市的支援

周明长¹

（宜宾学院 文学与音乐艺术学部，四川 宜宾 644000）

【摘要】：在三线建设时期，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东北先后向四川省内迁或援建企事业单位 70 余个、人员 30 余万。在东北工业化核心资源嵌入之际，在宏观上，国家以重庆、成都、自贡、渡口为中心采取“大分散”布局；在微观上，以 10 个小城市和 20 余个城镇为依托进行“小集中”布点，使四川数十个受援的城市、城镇获得了新的发展资源。一部分老的城市和城镇借此资源得到了长足发展，同时还建成了新的渡口市和一批新的工矿城镇。这种嵌入式运作，在强力推动四川城市布局和经济地图巨变之际，对四川和东北的后续发展带来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四川三线建设 东北的支援 四川城市布局变化 四川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279.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2）01-0025-008

近 20 年来三线建设研究取得诸多新成果，研究对象已涵括决策原因、方针政策、建设内容、建设过程、地方支援、建设成就、区域发展、经验教训、得失评价、调整改造、企业变迁、人物研究、与西部大开发关系、小三线、口述史、三线移民、职工生活、生态环境、工业遗产、三线精神、三线文化等¹，但对三线建设最重要组成部分的一二线地区支援三线地区的关注不够。²有鉴于此，笔者利用历史档案等资料，分析东北对全国三线建设第一重点省“四川三线建设及其城市发展”的支援成效，希望以此深化三线建设研究。

一、东北支援嵌入四川三线建设城市

中共中央决定，三线建设必须执行“充分依靠一二线现有的工业基础，一二线应当为三线建设出人、出钱、出技术、出材料、出设备”的方针。^[1]1964 年 9 月 4 日，中共中央“三线建设座谈会”一致认为，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工业交通和整个经济必须考虑重新布局，三线建设和一二线调整都必须按照战争打起来的要求，果断安排，迅速行动，绝不能强调困难，拖泥带水”。第二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决定：“铁路建设队伍要在 9 月底到达工地，计委、经委成立支援小组；一线调整要立即行动；基本建设投资，首先要保证三线建设的需要，其他方面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当前，三线建设的中心任务是成昆铁路建设，要成立铁路建设指挥部、西南三线建设筹备小组和后方支援小组，要什么给什么。西南建设以攀枝花为中心，重庆周围搞成一个小体系。在后方搞的厂子，一定要采用新技术。”^[2]从当年 10 月起，支援三线成了此后东北十年工作的中心任务。

按照 1965 年 8 月中共中央的三线建设规划，“1964 年至 1970 年共搬迁近 500 个项目（1967 年至 1970 年军工企业和科研机构尚未提出）。从一线迁出的职工约 19.8 万人，设备约 2 万台。”^[3]在此规划指导下，东北地区的国防科技、煤炭、电力、石油、冶金、化工、建材、森工、机械、轻工、建工、铁道、邮电、地质、农业、科研、高教和沈阳军区等 20 多个部门，先后向四川共计约内迁和援建企事业单位 70 余个、人员 30 余万、设备近万台。³

¹作者简介：周明长（1969—），四川德阳人，历史学博士，宜宾学院文学与音乐艺术学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城市史、三线建设。

基金项目：宜宾学院高层次人才科研专项“三线建设与西北地区城市发展研究（1964—2005）”（2019QD26）

在四川三线建设中，东北支援力度之大、涉及行业之广、搬迁设备之多、援建人员之众、持续时间之长，几乎与华东地区并列“第一位”。其中，国防科技工业、基础工业（能源原材料、机械制造）、基础设施（铁道、地质、运输）等行业明显领先于华东地区。根据相关统计，在全国内迁三线地区约 600 个项目中，东北迁出数约占 40%。据不完全统计，从 1964 年下半年至 1965 年，东北地区迁往内地和正在迁往内地的企业及技术支援项目共 140 个，调出约 8 万人左右（其中基本建

设队伍 2.7 万人）^[4]，其中内迁四川近 40 个。而在 1964—1970 年，仅辽宁省陆续迁往大三线的职工就有 99800 人，随迁家属 156600 人，^[5]全省工业部门超过 30% 的技术和管理骨干被抽调，很多甚至是整厂整矿搬迁。⁴如沈阳市铁西工业区外迁至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的 121 个市县的 103 个企事业单位，完成了建新厂、车间或生产线整体划拨、提供成套设备（包括单一关键设备），输送管理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生产骨干，提供整套产品工艺图纸、代培人员等支援任务，其中 10% 迁入四川。^[6]吉林省和黑龙江省也是重任在肩。1964 年 10 月，国家编制的《重庆地区三线建设规划》决定：“以重庆为中心迁建新建的项目有 212 个。计划从东北地区迁入 27 个。主要是与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配套的机械、仪器仪表、冶金、橡胶、化工、交通等行业的企事业单位。”^[7]为此，沈阳、大连、长春、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城市的国防科技企事业单位，大力援建了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和成都航空工业等基地，内迁职工万余人、设备千余台，如“沈飞”还为“成飞”复制移交了核心技术的模线样板、标准样件及全套图纸技术资料。⁵另据四川省统计，“从一二线地区内迁四川的企事业单位达 163 个，兴建军工企事业单位 123 个（生产企业 91 个，研究所 29 个，其他 3 个）。”^[8]其中，迁自东北的约 60 个。机械工业属于国家优先搬迁的部门（8 个机械工业部都有搬迁任务），其项目数在全国支援三线项目总数中所占比重最大，全国内迁之最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共援建和迁建了 241 个工厂、研究所（包括设计所），内迁职工 62679 人，设备 17727 台”^[9]，占全国内迁项目总数的 40%，其中从东北迁出近 100 个，迁入四川 20 余个。

中共四川省委在三线建设中，根据中共中央“必须立足于战争，准备大打、早打、打核（原子）战争”^[10]，“一切新建项目，都应贯彻执行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不得集中在某几个城市或点”^{[11]34}；搬迁项目要同三线地区整个工业布局统一安排，要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指示的“多搞小城镇”，实行“大分散、小集中，以达到战略隐蔽”；少数国防尖端项目“必须按照‘分散、靠山、隐蔽’的原则进行建设，有的甚至还要进洞”；一般军工企业和民用工业“应当尽可能靠近原料、燃料、水源、电源，并且把一些在生产上有密切联系的工厂成组地布置在一起，建成一些适当分散的工业点”；三线地区的大城市“今后除必需的配套项目可以摆一点以外，其他项目一般不要再摆”等方针^{[3]508-510}，决定全省三线企业的合理布局原则是“川西平坝地区（即成都平原），不隐蔽，又占良田，原则上不再摆工厂；重庆、成都两市目前企业已很集中，除了少数有关配套、协作的企业和生产精密、尖端产品的小型型企业外，不再摆厂；宝成铁路南段，通过能力有限，运输比较困难，用水、用电也不好解决，不宜多摆企业。今后工厂布局可考虑放在以下一些地方：宜宾以下长江沿岸，以及嘉陵江、涪江、渠江、乌江、沱江两岸地区；成昆（峨眉以南）、川黔、德天、广旺、广三、宜珙、资威等铁路沿线交通比较方便的地区；有些中、小型企业可以考虑放在乐山、南充、雅安、达县等公路交通比较方便的地区”。^[11]

有基于此，1964 年 9—10 月，中共中央和西南局从西南三线建设全局着眼，专门就四川三线建设作出了“两基一线⁶”的总体布局，决定“用三年时间，完成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的建设（共安排建设项目 84 个，投资 14.1 亿元）；同时，一面建设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一面修筑成昆铁路。从 1964 年下半年至 1967 上半年，国家安排在四川的国防、冶金、机械、化工、煤炭、电力、建材、轻纺等工业的建设项目共有 200 多个，其中多数属于国防工业的项目，或者是与国防工业配套和服务的项目”。该批项目主要由东北和华东负责支援，它们奠定了四川三线建设的总体骨架。其中“大多数分布在四川的腹地地带，主要是沿成渝、宝成、川黔、成昆等铁路干线两侧布点，一部分沿长江、嘉陵江、渠江两岸布点”。^[12]在此过程中，“除在重庆、成都、自贡、渡口四个省辖市建设各具特点、各有侧重的工业基地外，还在全省的 11 个地区、3 个自治州、70 个县、106 个点布局了工矿企业。”^[13]

以上计划的执行结果是，四川省大体实现了建设“四大城市型工业区”的目标，即由重庆、江津、南充、达县、涪陵、万县等城市组成的以钢铁、造船、常规武器等为主的川东（重庆）工业区，由成都、德阳、绵阳、江油、广元、乐山、雅安等城市组成的以航空、电子、机械、电力、核工业等为主的川西（成都）工业区，由自贡、内江、宜宾、泸州等城市组成的煤炭、机械、

天然气、化工为主的川南（自贡）工业区，由渡口（攀枝花）、西昌等城市组成的以钢铁及有色金属工业为主的川西南（攀西）工业区。^[14]由此可见，以四川盆地为重点的三线建设，在宏观上贯彻“大分散”原则而完成了全省工业重要项目“相对均衡化”的新布局，在微观上通过部分项目相对“小集中”布点而逐步建成了数个依托于城市城镇的新工业区和新工业点，从而为各相关城市城镇带来了新的发展资源。

当然，特殊时期以特殊方式所进行的四川三线建设，仍然同全国三线建设一样，因特殊历史条件的制约而产生了一些问题。改革开放以后，国家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三线建设调整改造。在此阶段，四川省进入国家计划内三线调整项目的数量、投资额位居全国第一，其中，现四川省有 41 个调迁项目、投资 44 亿元，现重庆市有 17 个调迁项目、投资 38 亿元，分别占国家计划内三线调整项目总数 206 个、总投资 223 亿元的 19.9%、19.7%和 8.3%、17%。这一大批调迁项目的完成，则在更大程度上发挥了“原东北支援项目”对其新迁建入川渝地区的多个城市发展的多种推动作用。

二、东北支援促进了四川三线建设城市的发展

从 1964 年下半年至 1979 年下半年，四川是接受东北支援最多的“省区”之一。优质资源“持续嵌入”和全省集中投入揭开了四川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新篇章，改变了数十个受援的城市、城镇的性质、规模和发展方向，形成了国防科技工业和重工业城市“优先发展”的新格局。

（一）城镇性质快速转变

三线建设时期四川各城市城镇性质的转变主要决定于其所建成的“三线项目工业性质”。以东北支援的乐山地区为例，夹江、峨眉、五通桥、沙湾、金口河等原农业县城、老城镇迅速发展为新兴工业小城市，建成了水电新镇龚嘴、能源新区牛石、机电新区桥沟、冶金新城九里、建材新区乐都、核能科研新区界牌、铁路机车新城崇仁、电子新区黑龙场、制药造纸新区青衣坝等 10 余个新兴工业城镇。^[15]从全省城市城镇性质因东北支援而转变的结果看，综合性工业城市有重庆、成都，重庆、成都、绵阳、江油、乐山、宜宾、泸州、西昌、华蓥、达县、涪陵则逐步发展为国防科技工业型城市。另外还有其他不同产业特色的城市。例如，煤炭工业城市渡口、华蓥，城镇如汉旺、威远、珙县；冶金工业城市渡口、乐山、达县、江油，城镇如西彭、青白江、沙湾、九里、厚坝、含增、武都；电力工业城市江油、宜宾、内江、乐山、渡口，城镇如安边、白马庙、龚嘴；石油天然气工业城市南充、自贡、泸州，城镇如厚坝、蓬莱、龙女、隆昌；化学工业城市自贡、泸州、宜宾，城镇如长寿、青白江、富顺、罗龙、纳溪；建材工业城市江油、渡口，城镇如峨眉、广安；机械工业城市重庆、成都、德阳、绵阳、内江、自贡、泸州、乐山、涪陵，城镇如双桥、灌县、广汉、汉旺、简阳、资阳；轻纺工业城市绵阳、遂宁、涪陵、乐山、自贡、内江、宜宾、泸州等。这一系列重工业城市城镇的“群体化崛起”，成为了三线建设时期四川省城市城镇发展的主要方向。

（二）城镇规模快速扩张

在三线建设中，四川“共建成三线企业事业单位 350 个（企业 287 个），其中大中型企业 248 个，占全省大中型企业总数的 42.2%，形成的工业固定资产原值 208.6 亿元，占全省国有工业固定资产原值的 60.2%”^{[8]77}。它们必然有利于推动相关城市城镇规模的扩张。

第一，数量规模扩张。国家在大山区投入巨资建成了全国三线最大新城渡口市。为了保障三线项目的尽快投产，国家对项目布点较多的城市和城镇进行了一定规模的改扩建，大体建成 10 余个新兴城市。据统计，1964 年，四川省共有重庆、成都、自贡、万县、泸州、南充、内江、宜宾 8 个建制市，占全国 167 个建制市总数的 4.8%，居全国各省、自治区第 6 位。1965—1976 年，全国共净增建制市 21 个，四川省净增渡口、绵阳、达县 3 个建制市；1977—1985 年，又净增西昌、乐山、德阳、涪陵、雅安、广元、遂宁、华蓥 8 个建制市。到 1985 年底，全省建制市增至 19 个，占全国 324 个建制市总数的 5.9%，居全国各省、自治区第 2 位。^[16]与建制市快速增长同步，1964—1974 年，上百个大中型三线项目在全省形成了 32 个沟片，一批小工矿城镇由之而

生，随着该批工矿企业投产，全省新形成和扩大了 70 多个城镇。^[17]例如，到 1977 年底，绵阳地区已经建成 45 个不同类型的城镇，其中，除了无较大工业规模的县城 13 个以外，新建成的工业城镇共有 32 个。^[18]到 1982 年底，四川省建制镇达 343 个，发展为全国建制镇最多的省，其中 147 个为县城所在镇，196 个是县城以外的镇。^{[17]758}建设于四川省 2/3 的建制市和约 30 个新工业城镇之中的“东北支援”项目是推动全省城市城镇数量规模扩张的诱因之一。

第二，人口规模扩张。1964—1967 年，随着四川 200 余个三线重点项目的全面施工，国家从省外调入各类建设人员超过 100 万。1968 年不包括军事工业和铁道兵，各部进川的人数达 44 余万，1969 年达 54 万。⁷^{[2]126-127}据统计，从 1964—1980 年，为支援四川三线建设，国家“从东北、华北、华东各省净迁入职工达 40 万人（不包括职工家属），是解放后四川省规模最大的人口净迁移时期”。^[19]其中，东北内迁职工约占 40%，如果加上家属，东北支援四川三线建设的非农业人口约 30 万。这必然会推动相关城市城镇人口的快速增长。例如，1965 年全省城市城镇非农业人口仅 664 万，1980 年全省城市城镇非农业人口增长至 902 万，增长 35.8%，比同期全国城市城镇非农业人口增长 29.4%高 6.4 个百分点。^[20]东北迁入人口数又占这 238 万净增非农业人口的 1/8。从重点城市看，1965 年底，攀枝花工业基地现场已集结外来工业人口近 10 万人，其中，辽宁 28337 人（钢铁、煤炭），黑龙江 2905 人（林业）。^[21]1976 年底，渡口城市人口突破 30 万，其中东北内迁职工及家属超过 10 万人 8，仅鞍山钢铁公司累计调往攀枝花钢铁公司领导干部及技术骨干就达 6799 人。^[22]从重点地区看，绵阳地区是全国三线建设投资额仅次于重庆市（含江津地区）的第二大地区，1965—1970 年初，仅绵阳、江油、广元、旺苍、剑阁、梓潼、德阳、绵竹、安县等地工矿区就新增供应人口近 50 万（主要是内迁职工）9。^[23]其中东北内迁职工及家属约占 10%。据不完全统计，三线建设时期绵阳地区城镇人口的成倍增长，除了三线企事业单位内迁职工及家属为主体外，还在绵阳地区招收了近 10 万名新职工。例如，截至 1971 年 11 月，根据国务院《关于改革临时工、轮换工制度的通知》精神，绵阳地区 59000 多名符合条件的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就已全部改为固定工。^[24]在该批新固定工中，包括数千名东北内迁职工的家属。到 1977 年底，绵阳地区城镇人口增长至 103 万，比 1963 年底增加近 60 万人。^{[18]173}其中东北内迁职工及家属约 7 万人。到 1980 年底，四川省已建成 5 万人以上的工业城镇 29 个，2 万人左右的工业城镇 40 多个，未设镇的工业点 60 多个。^{[17]381}由此可见，“东北支援”是城市城镇人口规模扩张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三，经济规模扩张。大量现代工矿企事业单位的内迁或援建、大批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的迁入，必然推动受援地区特别是直接受援城市城镇的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从工业门类看，全国 38 个主要工业部门四川样样齐全，全国主要工业行业约 160 个，四川有 95%。到 1976 年底，全省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已达 211.08 亿元，仅次于辽宁，居全国第二位。从四川工业生产能力看，1979 年与 1964 年相比，钢产量由占全国的占 4.7%上升到 8.5%，成品钢材产量由占 5.3%上升到 7.6%，原煤由占 4.7%上升到 6%，发电量由占 4.1%上升到 5.5%，天然气和化肥产量居全国第一。四川已经发展为全国规模最大和技术最先进的综合性国防科技工业基地，全国著名的三大电站成套设备生产基地之一（东北是其主支援方）、四大电子工业基地之一、五大钢铁基地之一（东北是其主支援方），工业生产能力和技术居全国第三位。^{[12]166-168}1978 年，工业产值在全省工农业总产值中由 1964 年的 46%提高到 64.5%，全省形成了以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其中，工农业总产值占全国的 6.31%，国民收入总额占全国的 7.3%，工业企业个数占全国的 12.5%，大中型企业占全国的 10.92%，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占全国的 7.52%，冶金、建材、化工等行业的一些主要产品产量在全国的位次居第三、第四；1980 年，四川省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322 亿元，位居全国各省市区的榜首。^{[8]77-78}从中心城市看，1982 年，重庆市在工业企业数、工业职工数、工业总产值方面，分别占西南三省合计的 12.4%、19.9%和 20.4%；在全国各大城市中，1983 年重庆市工业固定资产居第五位，工业总产值居第七位。1983 年，成都市在工业企业数、工业职工数、工业固定资产、工业总产值方面，分别约占西南三省合计的 10%~15%；工业固定资产和工业总产值均居全国各大城市中第九位¹⁰。同时，成都市和与之相邻 100~200 公里的德阳、绵阳两市和简阳、资阳、眉山、江油等县，共同组成了一个密集的城市群。^{[17]377, 379; [25]}作为四川省经济社会发展精华的“成渝工业城市经济带”的基本建成和初步成果，均与东北支援有着直接甚至重大的关系。

三、东北现代化工业要素输入四川城市

作为新中国工业长子的东北，资源丰富、体系完整、配套能力强、专业化水平高、技术先进、人才济济，不仅是三线建设前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重工业基地，而且是当时全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其“好人好马上三线”必然为四川城市发展输入

诸多现代化工业要素。

首先，优质人力资源输入。在四川三线建设所必需的庞大人力资源中，东北内迁职工不仅占据较高比例，而且成为了四川优质人力资源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仅以全国三线建设最大城市重庆为例，三线建设时期，随着沿海大批厂矿企业内迁，重庆地区迁入的熟练技工、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达4万余人。^{[7]239}这批优质人力资源在三线建设和以后国家经济建设的进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为加速四川三线建设，国家还从东北等地抽调上万名科技人员入川工作，在资源开发、国防科技、工业技改、交通建设、农业科技、地质勘探、地震测报和教育教学等方面均取得显著成绩，极大地提高了四川城市的科学技术水平。数万东北内迁职工的输入，在较大程度上完成了对四川城市人力资源总量和素质的一次大补充。

其次，先进工业化要素输入。东北支援所建成的多个重点项目，都配置有当时国内最先进的工艺设备、科学技术和管理制度，迅速为所在地区构建起了现代工业框架并形成了先进雄厚的工业生产力，填补了四川工业体系中的不少缺门和空白行业，使四川的工业部门、行业和工业体系得到了显著的充实、完善和提高。由于这批项目的建设模式、资金技术、人力结构、生产规模、产品质量、研发能力、科技水平等，都具备相当高的全国性服务能力和知名度，“大庆模式”“鞍钢宪法”“吉化经验”“北大荒创业精神”等东北工业化先进要素也随之输入相关城市城镇之中，从而为四川城市的多方面发展提供了优良的技术基础。以德阳为例，数千名掌握先进生产技术的优秀东北职工迁入后，使长期生活在闭塞落后的内陆农业县“德阳人”，从第二重型机器厂、东方电机厂、第二物探大队等大型企业的生产过程中，第一次“亲眼看见”什么是工业化大生产、什么是现代化企业、什么是现代化管理、什么是科学技术力量、什么是发明创造等先进工业化要素，这无疑为“德阳县”注入了一股股生机无限的新鲜血液，逐渐熏陶、浸染、渗透和改变着“德阳人”的思想观念、理想追求和行为方式，成为推动“德阳市”蓬勃发展的不竭动力。

再次，新生活方式输入。随着数十万城市“三线建设者”的迁入，除为四川城市城镇带来了新的工业生产线、科学技术和相关知识外，还带来了新收入、新语言、新食品、新风俗、新生活、新婚姻和新价值，从而在“落后”的四川城市城镇里实现了中国“东西南北”的生活习俗、人文价值和时代精神的大交汇、大激荡、大融合。就被支援的四川城市城镇来讲，代表着当时国内最先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东北内迁职工，在语言、收入、服饰、饮食、住宿、交通、职业素质、人文素养、价值取向、社会地位、教科文卫体等日常生活方面，总体上处于“先进”地位，必然在当地形成较大“示范效应”。例如，在衣着方面，1966年前后，第二重型机器厂的东北籍职工在冬季喜欢穿一种毛领长棉大衣，这种棉大衣比当地人常穿的土棉袄更贴身、更保暖且显得更为精神，这就让厂区附近的青年男女觉得很“洋气”，便争相“托人”购买，使毛领长棉大衣迅速在德阳县“流行”起来。在饮食方面，绵阳地区的本地人原本很少吃面食，随着爱吃“水饺、馒头、抄手”的东北籍、上海籍职工的大量迁入，本地人开始制作和吃水饺、馒头、抄手类的面食。总之，来自五湖四海的数十万“三线建设者”及家属，把各个地区的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带到了四川，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融合，当地人逐渐被“潜移默化”。其中，东北内迁职工日常生活中的东北大米、东北水饺、东北馒头、东北普通话、北京普通话、时装、发式、手表、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人际交往、休闲娱乐等内容，也迅速成为厂区附近部分城乡居民羡慕和模仿的对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以农业为主的 lifestyles 及其价值取向。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前20年里，凡是在建设有大中型三线企事业单位的城市城镇附近，一般都是四川省内非主要依靠政府财政举办的乡镇企业、多种所有制企业、商业服务业、社会事业、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等新兴的经济社会类项目，率先发展起来且较快地驶入一定程度上的专业化、规模化、效益化和城镇化相对协调的区域发展新轨道，并以更大力度推动着本区域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四、余论

东北地区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举全国之力”建成的全国第一个以重化工业和国防科技工业为主体的特大型综合性工业基地，聚集着新中国前15年工业化的国宝家珍和精兵强将，为新中国快速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作出了历史性重大贡献。从总体上看，东北通过支援四川，“嵌入式”地为四川提供了工业化启动所必需的基础资源和诸多先进的城市发展要素，加速了主要城市现代工业体系和重要城镇工业生产力的形成，推动了四川工业化和城市化高速发展，既缩小了四川与东北现代化程度的级差，也有力提升了新中国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综合实力。因此，从相当程度上讲，以国防科

技工业和重工业为主体的四川综合性大工业基地的基本建成,及其所催生的四川数十个三线建设城市城镇,这无疑是共和国“工业长子”东北在国家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强力作用下的巨大贡献。

在四川三线建设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快速进程中,东北因其核心资源被过度搬迁和调拨,国家财政投资大幅度削减,影响到东北大工业基地综合实力的正常发挥和相应发展。这种嵌入式运作,难免会有“此升彼降”的内在影响,它也是由东北全力支援四川和全国三线建设的内在机制性原因所决定的。¹¹突出例证是,一段时间之后,重庆、成都的工业总产值和综合竞争力渐次超越哈尔滨,同沈阳的差距明显缩小,“八五”末则超越了沈阳。当然,此种消极影响本身是一个长远过程的复杂产物,但今天的研究也是不可忽视的。

参考文献:

[1]周恩来.向中央书记处汇报提纲(节录)(1965年3月12日)[J].党的文献,1995,(3):37.

[2]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128-129.

[3]全国搬迁工作会议纪要(草稿)(1965年9月2日)[M]//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8—196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与建筑业卷),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512.

[4]王恩宝.辽宁在支援“三线”建设中的贡献[J].党史纵横,2011,(8):34-36.

[5]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辽宁省志·大事记[Z].沈阳:辽海出版社,2006:431.

[6]沈阳铁西工业区支援国内外工业建设[EB/OL].中华城市吧,http://tieba.baidu.com/p/6017484273.

[7]俞荣根,张凤琦,主编.当代重庆简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227.

[8]辛文.三线建设与四川产业基础的形成[M]//王春才,主编.三线建设铸丰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77.

[9]景晓春.当代中国的机械工业(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65.

[10]毛泽东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一周后的一个批示(1964年10月22日)[M]//军事科学院军史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七十年.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572-573.

[11]省委办公厅.关于三线建设的若干问题(1964年9月11日)[Z]//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三线建设在四川·省卷(上)[Z].成都:2016:33.

[12]杨超,主编.当代中国的四川(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40-144,149-150.

[13]辛文.对三线建设的一些认识[J].计划经济研究,1982,(8):2-8.

[14]本书编委会.中国城市建设年鉴(1986-1987)[Z].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376.

[15]乐山市人民政府,编.乐山三线建设[M].乐山:1987:175-181.

[16]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 编. 中国城市四十年[Z]. 北京: 中国统计信息咨询服务中心, 1990:9-11.

[17]刘清泉, 高宇天. 四川省经济地理[M]. 成都: 四川科技出版社, 1985:754.

[18]中共绵阳地委. 关于批转地区计建委党组关于加强城镇建设工作的意见(1978年5月10日)[Z]//中共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建国以来绵阳重要文献选编(1966-1978年). 绵阳: 173(原书缺印刷时间).

[19]沈益民, 童乘珠. 中国人口迁移[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2:162.

[20]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四川省志·城建环保志[Z].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626.

[21]中共攀枝花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中国共产党攀枝花史稿(1965—2001)[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2:17-18.

[22]鞍钢史志编纂委员会. 鞍钢志(上卷)[Z].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38.

[23]绵阳地区革委会生产指挥部. 关于当前缺乏劳动力情况的紧急报告(1970年4月20日)[Z]. 绵阳市档案馆: 74-1-54.

[24]绵阳市档案局, 编. 四川省绵阳地区大事记(1949—1985)[Z]. 绵阳: 1989:200.

[25]国家统计局, 编. 中国统计年鉴(1984)[Z].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4:49-50.

注释:

1 参见段娟. 近20年来三线建设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述评[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2, (6):100-109; 徐有威, 周升起. 近五年来三线建设研究述评[J]. 开放时代, 2018, (2):69-79; 张勇. 回溯与前瞻: 多维视角下的三线建设研究述评[J]. 宁夏社会科学, 2020, (2):135-142; 徐有威, 张程程. 2019年三线建设研究述评[J]. 三峡论坛(三峡文学·理论版), 2020, (2):61-65; 徐有威, 张程程. 2020年三线建设研究述评[J]. 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4):10-14+48.

2 参见王永华. 主政东北时期的宋任穷[J]. 世纪桥, 2009, (6):41-45; 王恩宝. 辽宁在支援“三线”建设中的贡献[J]. 党史纵横, 2011, (8):34-36; 谢忠强. 反哺与责任: 解放以来上海支援全国研究[D]. 上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4; 王毅. 三线建设中重庆化工企业发展与布局初探[J].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15, (2):36-42; 徐有威, 陈熙. 三线建设对中国工业经济及城市化的影响[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5, (2):81-92; 董志凯. 三线建设中企业搬迁的经验与教训[J]. 江西社会科学, 2015, (10):9-16; 周明长. 东北支援与三线城市发展[J]. 开放时代, 2018, (2):12-29; 黄巍. 突破与回归: 辽宁三线建设述论[J]. 开放时代, 2018, (2):30-48; [美]柯尚哲. 三线铁路与毛泽东时代后期的工业现代化[J]. 周明长, 译. 开放时代, 2018, (2):49-68; 陈超. 标签化的族群: 一个三线企业中的社会结构[J]. 周明长, 译.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5):46-55; 王智博, 曲洪波. 东北支援三线建设的贡献与意义[J]. 济宁学院学报, 2020, (1):66-70.

3 周明长. 三线建设与中国内地城市发展研究——以四川省绵阳、德阳为例[D]. 南京大学博士论文, 2019.

4 据2017年7月22日晚笔者在成都市大邑县雾山农场对“原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主任王春才”的访谈记录[Z].

5 据2019年1月5日晚笔者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对“原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主任王春才、中国涡轮研究院(原航空624研究所)原院长焦天佑、航空611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王建平”的访谈记录[Z], 据2019年1月23日下午笔者在德阳市政协对

其研究室主任陈育勇(成都军区空军正营职转业干部)的访谈记录[Z]; 沈阳市人民政府地方志编纂办公室. 沈阳市志·军事工业[M]. 沈阳: 沈阳出版社, 1992:213。

6 实际上, 该“两基一线”在 1965 年 11 月至 12 月初, 经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李井泉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现场考察后, 被扩展内容并上升为“两点一线(攀枝花、六盘水, 成昆线)”定位下西南大三线建设的主体框架, 到 1970 年底其主要项目大体建成。

7 说明: 在全国支援三线建设过程中, 因所承建项目竣工后, 有上百万的建设人员迅速迁出了三线地区。

8 据 2019 年 7 月 8 日晚笔者在成都市大邑县雾山农场对原三线建设者暨原攀枝花市委书记秦万祥的访谈记录[Z]。

9 说明: 1. 笔者根据多种资料估计, 在“新增供应人口近 50 万”中, 内迁职工的家属占有一定比例; 2. 在“新增供应人口近 50 万”中, 有超过 10 万属于国家从绵阳地区以外调入的建筑队伍、解放军工程兵、铁道兵、基本建设工程兵, 原包建援建单位的部分人员及其家属, 其在相关项目竣工后又大部分迁出了绵阳地区。

10 说明: 此处的重庆、成都工业发展数据均包括市辖县。

11 关于东北因全力支援三线建设而出现“区域发展机制受抑”问题, 笔者将另文研究。